

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

——以东亚双边争端为例

【新加坡】庄嘉颖 【英】郝拓德

【内容提要】 反复性紧张局势是双边争端的普遍特征。行为体间一系列反复发生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海上争端的基本特征。作者在已有的竞争进化论、学习理论与螺旋模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这类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未解决的争端中,反复出现的紧张局势会加剧双边对抗。由于争端行为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会使紧张状态持续,并刺激领导人在下一次危机中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反复性紧张局势会使双方的摩擦愈加频繁和强烈,同时反复性危机中的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鼓励他们在危机中孤注一掷而非采取妥协的策略。作者对比了一系列东亚海上领土争端中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从而说明这一逻辑。

【关键词】 持久竞争;紧张关系;领土争端;东亚;安全

【作者简介】 庄嘉颖(Ja Ian Chong),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郝拓德(Todd H. Hall),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15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4)09-0050-25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与部分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因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争端和事件而几度陷入紧张。这些事件包括2010年日本扣押中国渔民、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以及近期中越在西沙群岛钻井作业问题上的冲突。同时,一系列行为亦导致了区域内相关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本文不涉及对此类事件主体的是非评价,而试图探寻未来这些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可能引发的情势变化。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对危机事件进行理解和分析的路径:一种是在紧急事件平息后将其视为某一独立事件。实际上,对冲突中事件的一般分析路径是将该事件作为单个数据点(single data point),并找到诱发和升级此类事件的一般环境。该分析路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事件的发生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趋于紧张?另一种路径则将此类事件视为事态进一步发展的信号,具体而言是行为体间政治竞争关系的类型。从这一角度出发,事件的出现是紧张关系的结果而非原因。利益的变化并非来源于危机本身,而是源于行为体间潜在的关系以及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宿怨或其他结构性因素。

本文将提出第三种分析路径,这一路径建立在已有的竞争进化论、学习理论与螺旋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了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认为,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了解这些变化的成因有助于我们解释随后出现的各类危险。具体而言,笔者需要强调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反复性紧张事件与已知心理动态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行为体的政治态度、信息知觉与政治动机。据此,笔者对“紧张关系平息有助于危机解决”这一观点提出谨慎的质疑。

为阐释这一路径及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价值,笔者将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危机的后续影响,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本文暂不考虑这些危机中相关行为体的是非对错,而是探析反复出现的危机如何使国家间关系恢复至危机前的状态趋于困难。即本文关注的是长期存在的双边竞争关系中危机反复爆发可能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源。

在进一步展开论述前,需要对几个概念进行界定。本文将“紧张事件(episodes of

tension)”定义为“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利益争端”，单方面挑起危机的政治行为便属于此类事件，如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此外，全面危机（full-blown crises）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紧张事件。“未解决（unresolved）”事件的定义是，当下军事对峙的危机已经消退，但双方并未达成持续有效的争端解决共识。

二 危机与竞争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长期性双边竞争关系中的危机。其中，笔者主要探析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危机对两国间持续存在的竞争关系的影响。该路径主要关注国际政治中有关危机与竞争的已有研究，而不是关于讨价还价和信号发送的可信承诺、危机管理后的动力机制以及危机增减的可能性评估等相关研究。本文旨在希望更好地理解反复发生的危机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双边关系并使这一关系趋于紧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解危机事件中的紧张关系主要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将某一突发状况（incidents）视为独立的事件（events），通常关注危机发生的初始条件、动态升级和解决危机的可行途径。第二种路径则将危机和紧张局势视为某一深层问题进一步发展的信号，不论这种危机和紧张局势是更大结构力量还是彼此对抗的结果。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两种研究路径逐一论述。

珍妮丝·斯坦因（Janice Stein）将“危机”定义为“对基本价值的威胁、有限时间内做出回应的紧迫性以及可能对陷入军事敌对状态的认知”。^① 学者们对危机的研究兴趣并不需要过多解释。在危机时刻，看似不起眼的决策都可能导致战争或和平的巨大差异，因此，许多研究都关注危机事件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理性主义路径是对个体危机研究的传统路径。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研究起，多数理性主义路径都在引导决策者去考虑如何让渡并维护基本价值，同时将战争可能性减到最小。^② 在此类研究中，能在危机和紧张情势中获益的行为体，一般能够有效威胁到对手，让彼方认为坚持立场的代价很可能超出被争议的事或物的价值。

最新的相关研究则试图解释危机如何导致战争的爆发，即使危机主体双方均为理性行为体。基于战争成本理论，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认为拥有足够信息

^① Janice Gross Stein, *Crisis Behavior: Miscalculation, Escalation, and Inadvertent Wa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0, http://www.isacompendium.com/subscriber/toctnode.html?id=g9781444336597_yr2013_chunk_g97814443365975_ss1-27,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日。

^②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的理性行为体更倾向于将竞争目标类型化(如领土、政治控制等),这种方式将在未付出实际战争成本的情况下反映出各类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①因为一方行为体的实力与决心作为私人信息难以被对方全面知晓,故行为体通常有隐藏自身信息的动机,以便在双方交易中取得主动。反过来,这也让行为体无从了解对手的真实实力与决心,进而难以避免战争的爆发。理性主义者提出了诸多克服这一情况的方法,包括在双方交易过程中释放“强信号(hard signals)”。所谓“强信号”指不畏巨大损失,不惧潜在风险,展示自身决心,或者发表公开声明,如果让步就会遭受政治惩罚来约束自己。

不过,无论哪种视角都认为危机并不应该反复发生。史蒂夫·陈(Steven Chan)认为,“随着对抗的增加,行为体双方对对方实力与意图的不确定性会随之减少。每一轮连续性危机后,行为体双方对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实力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更倾向于避免新的危机”。^②危机本身会显示行为体的能力与决心,这反过来会解决导致危机发生的问题。因此,危机的反复发生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理性主义者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即“无力承诺”。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行为体之间均势不断变化,实力增长的一方为了获得更好的解决结果,以反映新的均势,总想违背先前的承诺。^③这一观点提出了危机反复发生的关键变量,但并未解释危机的发生对未来双边冲突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回到这一变量中。

除理性主义路径外,政治心理学和外交决策分析也有大量关于危机研究的成果。格拉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和里昂·曼恩(Leon Mann)的《决策制定:冲突、选择和承诺的心理分析》^④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艾利森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提出了官僚政治和组织过程要素对突发事件后果的影响。詹尼斯和曼恩则在个体与群体的层次上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动态心理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决策者如何应对冲突的发生。^⑤这一理论框架包括满意度(satisficing,非最优化但达到最低标准的选择)、强化(bolstering,为择优选择提供理

①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② Steve Chan, *Enduring Rivalries in the Asia-Pacif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

③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pp. 379-414.

④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p. 536; Irving L.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⑤ Irving L.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p. 70.

由)以及小集团思维(groupthink,因群体动力导致决策偏差)。无论哪种情况过程本身都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官僚政治、组织和心理要素才能对决策制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过程性要素的作用通常在研究中饱受争议,危机状态下高风险与高压力的环境因素对决策制定产生偏差甚至更大的影响。^① 政治心理学和外交决策分析两种研究路径均产生了大量的文献,^②但仍缺少总结性成果。更准确地说,这些文献主要是对决策制定者的研究,少有对危机后果的研究。各种制度或心理因素被认为是危机环境的既定要素,本身并不体现先前危机的作用,这些危机没有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

最后是定量研究路径,这种路径试图找到增加或降低危机爆发可能性的各种变量以及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马里兰大学的国际危机行为项目组积累了关于国际危机触发效应、相关背景及后果的大量数据。^③ 与危机爆发和升级相关的变量包括地理邻近性、政体类型以及国家存续时间。^④ 国际危机行为项目的研究对象包括长期冲突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分析者将危机置于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冲突背景之中。

事实上,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发现,长时期处于冲突状态下的双边关系更容易出现暴力升级并引发战争。迈克尔·布瑞歇尔(Michael Brecher)意识到,长期性冲突“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如不信任感外溢至其他双边互动领域。这一结果将使任何一个局部问题成为双方摩擦、对抗和相互威胁的来源”。^⑤ 尽管布瑞歇尔的论点展示了一个危机反复升级的过程,大多数长期性危机仍被视为预测并解释未来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背景变量,对动态的进化过程本身则无须过多解释。

一个完整的替代分析路径,应该把危机视为更宏观的潜在过程的发展征兆。例如,许多国际系统性研究路径并不预测具体的冲突,而是关注特殊系统结构中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对多极化的不稳定性

① Ole R. Holsti, “Crisis Decision Making,” in Philip E. Tetlock, et al., eds.,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84.

② 完整的观点,参见 Eric K. Stern, “Crisis Studi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sights, Synerg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2, 2003, pp. 183–202; Arjen Boin, “Lessons from Crisi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1, 2004, pp. 165–194.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Homepa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www.cidcm.umd.edu/icb/>,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日。

④ Michael Brecher, “Crisis Escalation: Model and Find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2, 1996, pp. 215–230.

⑤ Michael Brecher, “Crisis Escalation: Model and Findings,” p. 219.

论述最为著名。^①与此类似的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认为实力上升的国家将寻求建立区域内霸权,而霸权国会加以阻止,两者间将爆发更多的冲突。^②但上述路径均没有在理论上重视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军事权力分配。危机以及其他紧张事件是系统因素的作用结果,除了导致系统性战争并改变权力分配外,危机对改变整个事件本身的作用十分有限。

关注危机中的行为体双方而非国际系统性要素,可能为危机后果的理论化研究带来更为丰硕的成果。该研究路径的相关文献主要强调有关竞争主体双方的结构性(structural)要素。此类文献将竞争主体视为冲突中既定的二元结构,故被描述为“结构性”文献。^③有关竞争主体结构性的研究关注战争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问题,并假设双边关系都是由积极转向竞争。在早期对竞争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冲突与危机的相似性,采用了一种方法研究长期性冲突,即“争端密度”。^④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罗·迪尔(Paul F. Diehl)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操作化,得出了关于冲突爆发的重要结论,即“在全部可能的双边关系中,国际冲突一般来自其中的极少数,大多数(79%)争端均发生在某种敌对状态下”。^⑤

近期对国际竞争概念的操作化更为具体。例如,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通过对真实历史知觉的还原对竞争关系进行赋值,试图判断决策者是否将对方视为威胁、敌人或竞争对手。^⑥汤普森的研究找到了竞争引发军事危机和战争的更大可能性。^⑦此外,有关结构性竞争的著作中,不少学者将竞争关系的存在与否作为类型化的标准。亦有学者将竞争关系区分为原始竞争(proto rivalries)(两国间存在2-4项少于十年争端)和全面性持久竞争(full-blown enduring rivalries)(两国间存在超过5项持续十年以上的争端),^⑧但这种方式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对竞争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③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 12.

④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Enduring Rivalries: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Empirical Patter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2, 1993, pp. 147-171.

⑤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The Empirical Importance of Enduring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18, No. 2, 1992, p. 158.

⑥ William R. Thompson, “Identifying Rivals and Rivalrie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5, No. 4, 2001, pp. 557-586.

⑦ Michael Colares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Protracted Conflict, and Crisis Escal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3, 2002, pp. 263-287.

⑧ Gary Goertz and Paul F. Diehl, “The Empirical Importance of Enduring Rivalries,” pp. 151-163.

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多数关于结构性竞争关系的著作并没有提出,源于反复发生的紧张关系与危机的心理动力是如何影响了危机后续的变化与紧张局势的反复升级。

三 一系列未解决事件的后果:一种理论说明

以上研究路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突发与结构性变量如何影响紧张事件的反复发生以及战争的爆发。然而,我们仍需要分析先前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如何影响了未来国家间的互动。为何我们认为未解决的危机与紧张事件会产生反复效应?

目前已有许多理论承认,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将对行为体间的后续互动产生重要影响。此类观点的主要文献来源包括竞争进化论^①、国际关系中认知心理学的应用与后危机研究的早期著作^②以及最新的情感与情绪研究成果。^③接下来,笔者将提出关于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后果的几个假设,以对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进行整合。

假设一:一系列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将对手视为挑衅与敌对的一方,并对其未来的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

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双方对彼此留下负面印象,因为彼此间不存在对这一事件的共同理解和认识。紧张关系的持续使任一行为体对对方的利益诉求始终抱有负面认识,这种状态的重复,使长期处于一系列紧张关系之中的国家“在历史的对抗中逐渐积累不满与敌意”。^④

^①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2002;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ul R. Hense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state Rival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7, No. 2, 1999, pp. 175–206.

^②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Russell J. Leng,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Coercive Bargaining in Recurrent Cr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7, No. 3, 1983, pp. 379–419;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Paul Saurette, “You Dissin Me? Humiliation and Post 9/11 Glob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3, 2006, pp. 495–522; Oded Löwenheim and Gadi Heimann, “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Issue 4, 2008, pp. 685–724;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1, 2010, pp. 1–31;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2004, pp. 691–706.

^④ Paul R. Hense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state Rivalry,” p. 186.

对紧张关系的存续如何影响国家未来行为的解释十分必要。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所言,缺乏解释性框架便难以理解这个世界。^①解释性框架帮助我们认识并理解新的信息,特别是在信息内涵模糊的情况下。人们通过不同的理论理解并感知这个世界。我们早先对世界的理解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及什么是虚幻的事物。然而,当思维固化时,这种理解方式容易将我们带入一种错误的框架之中,或对模糊的信息过分依赖和信任。

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路径暗示,我们应该以贝叶斯理论的方式更新自身信念。^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基于对全新的、未经确认信息的信心改变我们对自身所持观念的信心。然而,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早先观念的影响,并且在后期很难改变。^③实际上,国际关系中许多信息本身都是模糊的,军备开支的增长是修正主义意图的信号或仅仅是官僚政治的产物?让步究竟是改善关系的真实意图还是试图让对方降低防备的欺骗信号?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世界是变化的,例如冷战后期国际局势的改变。苏联曾多次向美国示意,表达期待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愿望。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派人士将苏联的这一行为视为欺骗性行为或没有退路的让步,尽管事实与他们的观念相反,但他们仍将苏联视为充满敌意的国家。这就是认知心理学家所强调的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一个既定的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并影响我们对不确定信息的解读。不仅如此,在特殊情况下,行为体可能会创造性地重新解读一些看似明确但不符合自身预期的信息。正如我们看到很有说服力的魔术时,会跟自己说这不代表魔术的存在一样,行为者也可能以事后合理化来轻视与认知不符的证据。

总之,一旦行为体建立了对他者的负面观点,这种认识便很难被打破。正如负面观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一样,过去被认为是中立的行为亦会被负面解读,继而引发进一步的紧张关系。齐韦·毛兹(Zeev Maoz)和本·莫尔(Ben D. Mor)指出:“竞争者对声明和态度的调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欺骗手段,而敌对的态度则被认为是

①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17-202.

② 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s 1-3; George A. Quattrone and Amos Tversky,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3, 1988, pp. 727-730.

其真实意图的反应。”^①每一轮紧张关系的爆发都会反过来强化既有的预期和敌对的观念结构。这些紧张关系的加强受到情感与情绪的推进。紧张事件本身因陷入利益的冲突并与军事冲突紧密相连,故极易引发负面的情绪反应。当紧张关系缓和后,这种负面情绪会自然消退,但仍会在日后留下印迹。正如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指出的那样,先前的情感反应会留下“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也就是说,情感与刺激性事物紧密相连。^②负面的情感体验会给行为体带来负面的情感,反复出现的紧张事件会强化这种情感。总之,负面情感的积累会使行为体对对方的挑衅和轻视产生过度反应,而唤起这种负面情感的临界点会逐步降低。

情感亦影响人们解读世界的方式。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在其有关情感信念(emotional belief)的著作中,分析了情感对于行为体解读世界的影响和效应。默瑟指出:“情感信念是情感构成或强化了某种信念,这种信念使行为体对事物的确信度已经超越了现有证据本身。”^③也许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但因为情感的存在,我们仍然可以对结论表示怀疑。正如有心理学家所言:“通过鼓励个体更多、更好地了解某件事情而试图改变其情感的干预行为,从长远上看往往不会起作用,因为个体情感从性质上有别于事物一般的意义层次。”^④

总体而言,根据对未来互动行为的分析,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可能固化行为体对彼此的敌对意象。意象的敌意程度越高,意象越难改变,因为行为体更倾向于怀疑一些模糊或调解性的行为表达。处于紧张关系中的情感体验进一步支撑了对对方行为体留下的负面情感,这些情感不仅会在未来引发更强烈的行为反应,也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敌对的信念。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均势状态的改变会继续恶化这一后果,因为实力下降的行为体必然对实力优势上升的行为体产生恐惧和担忧。这种不安的状态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背景,即实力上升的行为体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修正主义倾向的信号,而先前无害的争端则被认为是更大的冲突的开始。随着这种担忧的发生,国家间反复发

①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2002.

② Antoni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G. P. Putnam, 1994.

③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p. 2.

④ Anna Samoilov and Marvin R. Goldfried, "Role of Emotion in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Vol. 7, No. 4, 2000, pp. 373-385.

生且仍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将会愈加突出。

假设二: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行为体的主张硬化,提升动用压服手法或暴力的意愿。

拉塞尔·伦(Russell J. Leng)在他关于多重危机的研究中注意到,连续性危机更容易使领导者在未来使用武力。他指出:“一个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国家没有充分的理由在下一场危机中继续妥协,而失败一方倾向于展示它们克服危机的决心,使先前处于竞争优势状态对手不再将其视为弱势方。”^①这一逻辑未免过于简单。胜利者总是在寻找下一次胜利的机会,而失败者也希望在未来的较量中更为强势,如此循环往复,双方武力威胁的程度会不断升级。相反,彼此让步与和解的意愿则随之降低。

这一情况会因认知偏差的存在而进一步恶化。^②首先,当行为体意识到自己在某一领域的损失后,就更愿意采取冒险行为。也就是说,当行为体察觉自己在过去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例如地位、领土、价值观等,它们更愿意在未来采取冒险行为。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以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为例对此做了解释,他指出,卡特政府正是在陷入高度危险和被动的情况下做出了派遣美军潜入伊朗解救人质的决定。^③就相关性而言,未解决的紧张事件每反复发生一次,事件的主体一方便会认为自身承受了某种形式的损失。这意味着在下一轮危机中,受损方更倾向于冒险采用军事手段夺回并捍卫自身的利益。

其次,正向错觉(positive illusions)的偏差会带来一定危险。^④行为体常常高估自身的能力并因此陷入盲目乐观的状态。一项著名的统计指出,大多数司机认为他们的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⑤遗憾的是,对自我能力的高估并不仅限于驾驶领域。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乔纳森·伦逊(Jonathan Renshon)指出,“正向错觉会带来极大的损害性后果,当冲突发生时或一方企图采用敌对行为时,正向错觉通常

① Russell J. Leng,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Coercive Bargaining in Recurrent Crises,” p. 384.

②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Why Hawks Win,”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12/27/why_hawks_win,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年7月20日。

③ Rose 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ranian Hostage Rescue Miss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237-263.

④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5 Hawkish Biases,” in Trevor Thrall and Jane Cramer,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Threat Inflation since 9/11*, Routledge: Abingdon, 2009, p. 82.

⑤ Ola Svenson, “Are We All Less Risky and More Skillful than Our Fellow Drivers?” *Acta Psychologica*, Vol. 47, No. 2, 1981, pp. 143-148.

会引发一些强硬的、侵略性的行为”。^① 危机尚未解决且反复发生、行为体转向武力政策这一后果,很可能是行为体高估了自身在冲突中的实力优势而导致的。这种正向错觉增加了行为体冒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最后,情感因素也是危机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行为体察觉自身在过去的对抗冲突中被轻视,这种经历会引发其耻辱感和复仇欲望。实际上,羞耻感和复仇欲望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复仇行为,受害者会重塑羞耻感,并从消极体验转向积极体验,复仇行为会使行为体从耻辱感中获得情感释放”。^②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复仇在国际关系领域暴力行为动机中所扮演的角色。^③ 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不仅可能使失败一方意识到自身的损失,也会令其感受耻辱体验并在下一轮竞争中实施复仇行为。这类形势容易促使行为者为了寻求复仇或避免更进一步的耻辱,而提升强硬手法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的后果,可能在逐渐积累后使双方转向强硬行为。从学习结果、认知偏差和情感反应等相关理论中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后果表现不仅存在于连续发生的紧张事件中,同样地,在平时,行为体需要获得军事实力,为更好地武装自己,或强化其与盟友的关系。当实力上升并获得来自盟友的支持时,行为体对自身的强硬行为便有了足够的取胜信心,并在未来引发更危险的一系列行为。

假设三: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可能带来直接与间接双重后果。

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对信仰、态度和情感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直接后果包括影响核心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间接后果则是通过政策操作影响国内政治环境。直接后果十分容易理解,随着每一次危机或突发事件的爆发,决策者强硬的态度会通过其具体的行为选择反映出来。正如国际关系中对个体角色的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一段持续的紧张关系或危机中,个体层次的因素会扮演重要角色。^④ 同时,情势所造成的压力也可能让心理偏差(psychological biases)的效应更为重要。^⑤ 国内政治背景会影响决策者在未来冲突中的行为。前文所提到的各类危机后果会在公共层次

①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5 Hawkish Biases,” p. 82.

② Oded Löwenheim and Gadi Heimann, “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96–697.

③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5–188; Oded Löwenheim and Gadi Heimann, “Reve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85–724; Paul Saurette, “You Dissin Me? Humiliation and Post 9/11 Global Politics,” pp. 495–522.

④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107–146.

⑤ Ole R. Holsti, “Crisis Decision Making,” pp. 9–84.

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影响领导人的国内选民对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态度。当公众态度(public attitude)(或领导者继续执政必须依赖的社会舆论)随着紧张关系的反复发生进一步恶化时,将产生更大的影响。^①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选择效应。也就是说,公众此时更倾向于支持奉行强硬立场的领导人而非温和派领导人。其次,即使领导人在危机不断升级时不会被取代,他们仍可能受制于公众舆论。换言之,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平息舆论或政府内部不同声音的挑战和质疑。最后,鉴于对抗性政策符合国内民众的事实预期,原本强硬的领导人在此时则不会受到过多的舆论束缚。无论这种公众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实际上结果是一致的,即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增加领导者采取强硬手段应对危机的可能性。

概括而言,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使危机中相关行为体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并增加未来爆发冲突的风险。紧张关系可能得到缓和,但反复发生且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在未来留下诸多麻烦的根源。

上述总结似乎过分理论化,但其并非一个简单的臆想。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事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德关系与当今的中美关系做类比的不恰当性,^②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教训。实际上,战争爆发前数十年反复发生和未解决的冲突,它的模式可以验证笔者在前文所提出的假设。^③

具体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伴随着一系列紧张事件的出现而最终爆发。这些紧张事件包括1905-1906年以及1911年发生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国内动乱。^④随着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当事行为体对其对手的不信任感随之增加,并更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读对方的行为内涵。厌恶的情感会进一步催化行为体之间的不信任感并引发对一些小型事件的过度反应,例如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的协

①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p.316-317;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pp.216-244.

② Ja Ian Chong and Todd H. Hall,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1, 2014, pp.7-43.

③ Ja Ian Chong and Todd H. Hall,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pp.7-43;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p.310-317.

④ David Stevenson, "Militarization and Diplomacy in Europe before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1, 1997, pp.125-161.

定^①、法国外籍军团对待德国逃兵事件^②等,均被视为挑衅威胁事件。不满情绪的积累加剧了体系的风险。

与此同时,行为体会意识到自身在新一轮的对抗中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当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危机的随之爆发便集中展示了这种变化。奥匈帝国在扩张初期遭到了俄国与塞尔维亚的反对,战争一触即发。德国反过来放在其南部地区部署重兵援助奥匈帝国的风声,企图威胁俄国,迫使沙皇政府与塞尔维亚让步。德国与奥匈帝国遂意识到,暴力威胁可以促使俄国退却,正如当时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埃伦塔尔(Alois Aehrenthal)所言:“只有利用强硬的手段时,胜利才是确定的。”^③对于俄国而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更是一种耻辱,俄罗斯绝不会让它延续”。^④俄国随即着手于强化国家的军事实力。

因此,危机会带来直接和间接两种后果。就直接后果而言,凯撒·威廉(Kaiser Wilhelm)在先前两次危机中经历耻辱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用“这一次我不再屈服”^⑤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态度。危机的间接性后果同样显而易见。理查德·勒博(Richard N. Lebow)曾经提到,“法俄之间的权力变化(倒向鹰派)发生在波斯尼亚和阿加迪尔危机之后,摩洛哥和波斯尼亚危机提升了英国外交部内的强硬派的影响”。^⑥

上述事实将一个世纪前的欧洲带入战争边缘,同时,广义的竞争进化论认为这些事件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代背景。^⑦实际上,反复发生且未解决的紧张事件会带来诸多恶性后果。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上述动力机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①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0-33.

② Michael E. Nolan, *The Inverted Mirror: Mythologizing the Enemy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98-1914*, Oxford: Berghahn, 2005, pp. 14-15;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3, p. 400.

③ Politisches Archiv XII/357, Aehrenthal to Wekerle, March 31, 1909,转引自 F. R. Bridge, *The Hapsburg Monarchy among the Great Powers, 1815-1918*, Oxford: Berg, 1990, p. 295;同时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 407.

④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 259.

⑤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y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5, p. 478;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p. 52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p. 529.

⑥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p. 316.

⑦ Zeev Maoz and Ben D. Mor, *Bound by Struggle: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Enduring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2002;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2009; Paul R. Hensel,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state Rivalry,” pp. 175-206.

四 中国和邻国间反复出现的紧张事件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部分检验中国和邻国间反复出现的危机事件——最近尖锐化的海上领土争端。本研究只阐明反复性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所以根据研究主旨选择研究案例。其他议题如危机起因、信号发送和危机谈判不在本研究范围内,也不会突出展示在案例中。

本部分具体考查反复出现危机的中日、中越、中菲双边关系,并与没有出现危机的中国-马来西亚关系进行对比。本研究遵循研究主旨,保持冲突一方(中国)不变,也就控制了冲突类型的效果以及国别与区域的条件。最近一轮的反复性危机大约始于2009年年初,这有利于我们控制外部条件的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因为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冲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方法能独立地考察反复性危机的效果。

尽管笔者想尽可能清晰地提出每个反复性危机中发生的事件的序列,但没有把双边关系中的冲突分解为几个不同阶段。经验证据也没有显示出明确的不同阶段,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把数据塞入阶段的努力可能掩盖(而非揭示)更多的真理。^①

(一) 中日关系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的中日关系清楚地表明:反复性危机能加剧分歧,为冲突升级埋下诱因。虽然2005年中国爆发了一轮反日游行,但直至2009年,两国关系似乎相当平稳。之后,围绕钓鱼岛及东海的争端使双方立场日趋强硬,诱发甚至鼓励了更具挑衅性的行为,缩小了对话的空间。这些变化使两国精英和民众更容易接受具有对抗性的计划与行动,而不愿考虑妥协的可能。2009年5月,应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中国提交了关于东海主张的普通照会。在此期间,中日双方都在努力限制海上争端。

2010年,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只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了渔船船长。日本政府计划依据日本国内法起诉该船长,但在中国政府看来,此举等同于日本在争执海域行使“主权”。中国政府随即提高了包括准军事部队的船只参与的在争议海域巡逻的频率,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反日游行。当日本政府决定释放中国船员时,中国要求日本做出正式道歉,赔偿相应损失。日本则要求

^①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pp. 33-42.

中国做出道歉,为“渔船事件”做出赔偿。

2012年日本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方案激发了新一轮中日危机,双方都知道避免冲突升级的重要性,但都没有让步的意愿。2012年年中,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称:东京都将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钓鱼岛,在岛上修建设备,驻扎人员,进行地质勘查。日本野田政府认为此举公然挑衅中国,所以提出岛屿“收购”与“国有化”计划。野田政府相信中国政府和日本民众都能接受他的和解方案。^① 尽管如此,日本政界后来才意识到,通过外务省与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进行沟通也许向中国发出了混乱的信号。^②

日本政府向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表达“国有化”计划后,中方马上提出强烈的批评。在2012年下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当面警告日本首相野田,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③

钓鱼岛“国有化”激化了两国的对峙局面:中国出现全国性反日游行,中国政府加强了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空中和海上巡逻。日本政府仓促应对,派出船只和飞机拦截要在争执海域或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的中方船只和飞机。

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识别区涵盖中日争议地区,其中就有钓鱼岛。^④ 依据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规定,穿过该区域的飞机必须事先通报中方,否则可能被拦截。

上述反复出现且未解决的中日危机似乎增加了双方民众间的对立情绪,也使政治家强调对抗而非妥协。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3的中国民众和93%的日本民众对对方持有非正面的看法,大部分日本人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⑤ 2013年6月和

① 作者对现任和前任日本国防部和外交部官员的访谈。

② 作者对现任和前任日本国防部和外交部官员的访谈。

③ 《日媒:钓鱼岛争端恶化 胡锦涛曾当面斥日首相》,载《大公报》,2013年6月23日, <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3-06/1708310.html>, 登录时间:2014年8月8日。

④ 李宣良、王经国:《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4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1/24/nw.D110000renmrb_20131124_7-01.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中国空军在我东海防空识别区首次空中巡逻》, http://www.gov.cn/jrzq/2013-11/23/content_2533284.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⑤ Pew Research Center,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in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Japan-Opinion of China,”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09/>,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July 2014,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group/7/>,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7月,由《中国日报》和言论(Genron NPO)进行的调查显示,98.2%的中国人和90.1%的日本人对方国家持有消极看法,^①相比2012年的数据,中国上升了28%,日本上升了5.8%。77.6%的中国人和53%的日本人把钓鱼岛的持续争端列为不快的主要原因。双方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使领导人更难采取妥协立场。事实上,反而鼓励了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更强硬的政策。

日本民众担心中国变得更加“武断(assertive)”,这似乎为当下的安倍政府创造了宽容的环境:安倍重新解读日本宪法,为解禁集体自卫权争取更多空间。^②中国之后做出严厉谴责,指出安倍政府此举是对中国以及区域稳定的潜在威胁。^③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启动了对河野谈话的审查过程。这两个举动在中国眼中充满挑衅意味,在日本国内却只遭遇了有限的抵制。^④这为中日间更大的摩擦和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 中菲关系

根据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和菲律宾于2009年5月前提交了各自的主张,最近一轮的中菲冲突出现了。提交南海主张的除了中国和菲律宾,还有越南和马来西亚。^⑤2009年2月,菲律宾国会颁布《领海基线法》,为菲律宾的主张提供

① “Bad Feelings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Worst in a Decade: Poll,” http://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3/08/08/Bad-feelings-between-Chinese-Japanese-worst-20in-a-decade-poll/UPI-35351375978657/#ixzz2tOzD3vDQ,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②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Cabinet Chief Secretary,” http://japan.kantei.go.jp/tyoukanpress/201407/1_a.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③ 《2014年7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jzhsl_602247/t1170302.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④ Maiko Takahasi and Takashi Hirokawa, “Japan’s Abe Sends Traditional Offering to Yasukuni Shrine,”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4-21/japan-s-abe-sends-traditional-offering-to-yasukuni-shrine.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笔者对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的访谈。

⑤ Malaysia and Vietnam, “Joint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in Respec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mys_vnm2009executives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 Partial Submiss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on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ursuant to Article 76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phl22_09/phl_esh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Note Verbal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joint submission made by Malaysia and Vietnam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ML/17/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09re_mys_vnm_e.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国内法的支持。^①新一轮紧张事件爆发,中菲都尝试在争议海域以实际行动宣示主权。中菲之间的冲突升级也反映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中(菲律宾是东盟的创始国之一,而中国一直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提交主张后,中菲都开始驱赶、逮捕在争议海域活动的对方渔民,最终形成海上对峙的局面。2009-2012年,来自中国农业部渔业局和菲律宾海军的船只驱赶对方渔船,拘捕对方渔民。^②菲律宾政府在2010年河内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劝说东盟成员国和美国,要它们向中国发出警告。^③美国和东盟其他成员国呼吁各方遵守法律规范,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提出严厉谴责。^④

2010年的事件刺激菲律宾政府进一步宣示其南海主张,展现其防御力量,这被中方视为对抗行为。菲律宾在礼乐滩附近海域进行地理勘测,把自己的主张(菲律宾和中国分别于2011年4月5日和14日提交主张)提交给联合国。^⑤2011年6月,五名菲律宾议员登上争议海域附近的中业岛,重申其南海的主张。同时,菲律宾通过军事演习、购买军舰加强海军力量,试图强化和宣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⑥菲律宾的举动导致双方开始用官方船只驱赶渔船。

2012年4月,菲律宾海军企图逮捕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渔民,并与中国海监船只

①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Fourteenth Congress, Regular Session, “Republic Act No.9522, an Act to Ame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Republic Act No.3046 as Amended by Republic Act No.5446, to Define the Archipelagic Baseline of the Philippin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http://www.lawphil.net/statutes/repacts/ra2009/ra_9522_2009.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② Ian Storey,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mplications of the Reed Bank Incident,”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7902#.U8z2XFbSZ9Q,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6日。

③ Richard Weitz, “Why US Made Hanoi Move,” <http://thediplomat.com/2010/08/why-us-made-hanoi-move/>,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6日;笔者对新加坡相关官员的访谈。

④ Hillary Rodham Clinton, “Press Availability,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Hanoi, Vietnam,”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Bonnie Glazer and Brittany Billingsley, “U.S.-China Relations: Tensions Rise and Fall, Once Again,” http://cis.org/files/publication/1003qus_china.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9日; Richard Weitz, “Why US Made Hanoi Move,” <http://thediplomat.com/2010/08/why-us-made-hanoi-move/>,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6日。

⑤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Note Verbale*, 11-00494, No. 228, April 5, 2011,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phl_re_chn_2011.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e Verbale*, CML/8/2011, April 14, 2011,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11_re_phl.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⑥ Linda M. Johnson, “U.S. Coast Guard Transfers High Endurance Cutters to the Philippines and Nigeria,” in *Delivering the Goods: News from the U.S. Coast Guard Acquisitions Directorate*, May 2011, pp.1-3, <http://www.uscg.mil/acquisition/newsroom/pdf/cg9newslettermay11.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形成对峙局面,^①两国间的冲突加剧了。在两国国内和海外移民社区都爆发了游行,双方民众在网络领域展开较量。中国抵制菲律宾出口的水果,暂停前往菲律宾的旅游项目。^②

黄岩岛事件引发了菲律宾的后续行动和中国的反制措施,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在2012年6月和11月举行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和东盟峰会上,菲律宾试图将黄岩岛冲突列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通常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发布)。^③但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会议上,东盟成员国并未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意见,菲律宾的打算落空了。最终,东盟首次未能在部长级会议后发布联合声明。随后,在没有告知其他东盟成员国的情况下,菲律宾于2013年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建立南海仲裁法庭的正式请求。中国对此非常不满。^④

当前的环境可能使中菲的冲突状态进一步恶化。2013年,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御合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日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⑤菲律宾提升海军和空军力量,最迫近的目标很可能是“防卫领土”与“宣示主权”。2014年年初,当菲律宾的船只为仁爱礁上的哨站提供补给时,遭到中方船只的驱赶,尽管中国在2013年年末与

① “Standoff at Scarborough Shoal,”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101east/2012/07/201273093650328417.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② Ely Ratner, “Learning the Lessons of Scarborough Reef,”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learning-the-lessons-scarborough-reef-9442>,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③ Ernest Z. Bower, “China Reveals Its Hand on ASEAN at Phnom Penh,” <http://csis.org/publication/china-reveals-its-hand-asean-phnom-penh>,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Mary Kozlovski, “Sea Dispute Lingers at ASEAN Summit,” <http://www.dw.de/sea-dispute-lingers-at-asean-summit/a-16397985>,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Jane Perlez, “China Stalls Move to Quell Asia Disputes over Territor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12; 对东盟相关官员的访谈。

④ “Statement: The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the UNCLOS Arbitral Proceedings against China, January 22, 2013,” <http://www.gov.ph/2013/01/22/statement-the-secretary-of-foreign-affairs-on-the-unclos-arbitral-proceedings-against-china-january-22-2013/>,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⑤ Rene P. Acosta, “Japan, Philippines Push for More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apdforum.com/en_GB/article/rmiap/articles/online/features/2013/07/08/philippines-japan-cooperation,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Julio S. Amador III, “The Philippine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sia-Pacific Bulletin*, No. 227, 2013,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rivate/aph227.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act Sheet: U.S.-Philippines Bilateral Relations,”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8/fact-sheet-united-states-philippines-bilateral-relations>,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Delon Porcalla and Evelyn Macairan, “Coast Guard to Get 10 More Vessels with Japan Loan,” <http://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13/12/16/1268607/coast-guard-get-10-more-vessels-japan-loan>,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2日。

东盟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指导方针的谅解。^①

持续的南海争端也透露出双方民众对对方的消极态度,特别是菲律宾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截至2014年年中,一项皮尤民调显示,62%的菲律宾人对中国持有非正面的观点,在2013年和2002年,这一比例是53%和37%。^②93%的菲律宾人把持续的领土争端视为本国的首要议题,比前一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③

类似的民调虽有局限,但仍显示出菲律宾民众因南海分歧对中国持越来越负面的情感。民意减小了政策的灵活性,也鼓励了更加强硬的路线。菲律宾民众和精英的态度削弱了寻求妥协的动机,而妥协本可以减小未来冲突激化的可能。

(三) 中越关系

越南开始重视海洋议题,和中国一起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呈交主张,^④中越间冲突开始显现。2006年开始,越南加强了海上石油勘探行动,进入了争议海域,并于2007年把控制下的南沙群岛升级为“镇”。同年,越南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旨在将海洋产业占经济的比重从2005年的48%提高到2020年的55%,增长部分主要来自渔业和石油。^⑤2009年,越南向联合国提交了两份主张,一份由越南单独提交,另一份与马来西亚联合提交。此时,中国也提交了主张,部分原因是回应其他南海

① Abdul Khalik and Desi Nurhayati, “South China Sea Guidelines Agreed,”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1/07/21/south-china-sea-guidelines-agreed.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1日; “Full Text of ASEAN-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10th Anniversary of DOC on South China Sea,”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45396.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New Guidelines on South China Sea,”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1-07/24/content_23056964.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in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group/7/>,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in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Opposition to U.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④ Malaysia and Vietnam, “Joint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in Respec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mys_vnm2009excutives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Note Verbal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joint submission made by Malaysia and Vietnam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ML/17/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09re_mys_vnm_e.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⑤ Le Hong Hiep, “Vietnam’s Strategic Trajectory: From Internal Development to External Engagement,” in *Strategic Insigh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2012, p.9.

声索国。^① 在西沙群岛作业的越南渔船越来越多,被中方拘留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两国分歧加剧。^②

自2009年,由于缺少清晰的解决或妥协方案,中越冲突继续升温。2009年和2010年,越南通过外交部举行了两次大型国际会议,作为东盟2010年的主席国,越南努力缔造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③ 越南的行动公然对抗中国长期以来的偏好——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议,避免南海争端成为国际议题。

2010年,越南总理阮晋勇走访西沙群岛中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岛屿,在中越不断驱赶和拘捕对方渔民的背景下宣示了越南的主张。^④ 在后续事件中,越南渔船一度包围一艘中国渔政船只,越南在争议海域加强侦察活动,中方船只两次切断越方船只牵引的传感器。^⑤ 2011年6月,越南在争议海域举行实弹演习,显示维护主张的力量和决心。^⑥ 2012年的报道称,越南炮艇围堵中国渔船,随后被中国渔政的舰只驱散。^⑦

2011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到访中国,双方试图淡化冲突。^⑧ 但是,2012年越南颁布法律,正式确认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管辖权”。中国立刻回应,成立三沙市,

① Malaysia and Vietnam, “Joint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in Respec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mys_vnm2009executives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Partial Submission in Respect of Vietnam’s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North Area (VNM-N),” VNM-ES-N-DOC, April 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vnm37_09/vnm2009n_executives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pril 4, 2013, p.5, http://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Michael_Swaine_Testimon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③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p.10; Michael D. Swaine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5, 2011, p.16.

④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pp.11-12.

⑤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p.5, p.11; Michael D. Swaine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16.

⑥ Tania Brannigan, “Vietnam Holds Live Fire Exercises as Territorial Dispute with China Escalates,” *The Guardian*, June 14,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jun/14/china-vietnam-dispute-military-exercise>,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⑦ 程刚:《广西渔船遭五艘外国炮艇包围 中国渔政302独自救回》,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2_06/02/14998118_1.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⑧ 《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访华》,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0/11/9762899_0.s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其辖区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沙群岛。^①

中越分歧也渗透到2012年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和东盟峰会。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会议上,柬埔寨努力避免在东盟联合声明中提及南海争端。^② 2013年,中国最南部的省份海南省还发布管理条例,规定在南海作业的渔船必须进行登记。而此时,越南正在抱怨中国官方船只对越南渔船的驱赶行为。^③

由于缺少解决分歧的明确步骤,两国又极力宣示对西沙群岛外围海域的主权,2014年年中,摩擦发展为定期的直接冲突,甚至激烈的抗议。2014年年初,在中越边境战争35周年纪念日,越南爆发了反华游行。^④ 2014年6月,中国的石油公司在西沙群岛附近建起一座钻井平台,进行勘探作业。^⑤

皮尤全球公民态度调查显示,84%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持有非正面的观点,74%视中国为主要敌人,84%认为海上争端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冲突。^⑥ 在这样的民意条件下,中越都很难在海上领土争端中让步。

(四) 中马关系

相比上述个案,中马关系中的危机较少,局势也不是很紧张,尽管两国对南海部分区域都宣称拥有主权。应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要求,马来西亚于2009年年初

① 三沙市人民政府:《三沙概览》,http://www.sansha.gov.cn/data/news/2013/12/762/,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中国设立地级三沙市 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21/15478078_0.shtml,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Ernest Z. Bower, "China Reveals Its Hand on ASEAN at Phnom Penh," http://csis.org/publication/china-reveals-its-hand-asean-phnom-penh,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Mary Kozlovski, "Sea Dispute Lingers at ASEAN Summit," http://www.dw.de/sea-dispute-lingers-at-asean-summit/a-16397985,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与东盟相关外交官的访谈。

③ Michael D.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p. 5, p. 11; Michael D. Swaine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p. 16; 刘云亮:《完善我国南海海域管辖制度的法律构思》,http://www.bianjiang.cass.cn/news/698593.htm,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中国学者对海南捕鱼新规定的解释》,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0f80d10101fx1n.html,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吕宁思:海南捕鱼新规定 宣示领海主权》,http://phtv.ifeng.com/program/zbjsj/detail_2014_01/10/32901288_0.shtml,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④ Chris Brummitt, "Vietnam Deploys Dancers to Foil Protests,"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vietnam-deploys-dancers-foil-protests,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⑤ Carl Thayer, "China's Oil Rig Gambit: South China Sea Game-Changer?"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chinas-oil-rig-gambit-south-china-sea-game-changer/,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Ankit Panda, "Chinese, Vietnamese Coast Guard Boats Collide," http://thediplomat.com/2014/06/chinese-vietnamese-coast-guard-boats-collide/,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⑥ Pew Research Center,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group/7/,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和越南一起提交了南海主张。^①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 (Abdullah Ahmad Badawi) 也走访了西沙群岛的弹丸礁。马来西亚在岛上建造潜水度假村、海军哨站和飞机跑道,显示马方的主张。^② 2009年5月,中国做出回应,在第二份普通照会中提出九段线的主张。九段线南部和马来西亚的主张区域有重合之处。^③ 来自中国渔政、国家海洋局和海警的船只经常在马方主张的海域巡逻。比如,2011年中国船只在新加坡停靠后前往争议海域,宣示中方主权。^④

不同于南海问题的其他争执国,马来西亚承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中马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也不多见。马来西亚高层官员重申外交是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方式,公开表明马方接受中方在争议海域的巡逻行动。^⑤ 2012年东盟会议上,马来西亚在东盟发表南海问题联合声明问题上保持沉默。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马来西亚也没有带头含蓄地批评中国。^⑥ 马方一直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对此

① Malaysia and Vietnam, "Joint Submission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Pursuant to Article 76, Paragraph 8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in Respect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mys_vnm2009excutivesummary.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e Verbal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joint submission made by Malaysia and Vietnam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ML/17/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09re_mys_vnm_e.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② S. Mahmud Ali, *Asia-Pacific Security Dynamics in the Obama Era: A New World Emerging*,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p. 124; William Choong, "Salami Slicing ASEAN Solidarity,"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salami-slicing-asean-solidarity/>,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③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e Verbal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joint submission made by Malaysia and Vietnam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ML/17/2009, 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09re_mys_vnm_e.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4日。

④ 徐惠芬:《中国海巡31船出访途中将巡航南海维护主权》,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6-16/0804652245.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我国出访新加坡巡航线将从北向南纵贯南海》, <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6-16/1501652312.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笔者对新加坡外交官员的访谈。

⑤ Felix K. Chang, "A Question of Rebalancing: Malay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http://www.fpri.org/articles/2014/07/question-rebalancing-malysias-relations-china>,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1日; Sharon Chen, "Malaysia Splits with ASEAN Claimants on South China Sea Thre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8-28/malaysia-splits-with-other-asean-claimants-over-china-sea-threat.html>,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7日; Johan Saravananuttu, "Malaysia in the New Geo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n Nicholas Kitchen, ed., *The New Geo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12, pp. 47-50.

⑥ 笔者对新加坡外交官员的访谈。

也保持低调。^①

相应地,两国因南海问题而产生的引人注目的紧张局面很少出现。这一点或许在马来西亚失踪航班 MH370 的搜寻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该航班上有大量的中国乘客。马来西亚政府和管理空中航线和搜索时犯了明显的过失。搜索行动引发了中国政府和公众的严厉批评。^② 但是,尽管马来西亚民众对中方评论普遍不满,马来西亚政府仍表现得十分克制。中马在飞机失踪事件上的紧张局面很快过去,似乎事件对双边关系和两国的领土争端没有产生影响。皮尤 2014 年年中的民调数据很具有说服力:74% 的马来西亚人对中国持有正面观点,27% 的马来西亚人视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③

五 结论

尽管需要更多细节作为支撑,上述案例已经有力证明了反复发生且尚未解决的危机可能在未来导致紧张关系的升级。争端行为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会使紧张状态持续,并刺激领导人在下一次危机中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若危机的发展不利于己方,为改变被动局面,在冲突中曾过分退让而受到公众舆论指责的领导人同样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方式或冒险行为。^④ 随着新一轮危机的爆发,行为体对危机的升级愈加敏感,当行为体察觉自身在某一领域的损失后,让步也变得愈加困难。这说明当危机反复发生时,潜在的双边关系已经十分危险并趋向爆发冲突。这种情形说明,如果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假设成立,同时双方意识到自身所处的损失状态,冲突的

① Greg Lopez, "Malaysia-US and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http://asiapacific.anu.edu.au/newmandala/2013/10/24/malaysia-us-and-malaysia-china-relations/>,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Andrew J. Shapiro, "U. S. - Malaysia Partnership," <http://www.state.gov/v/pm/rls/rm/184846.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0日。

② 米强、杰里米·格兰特:《中国乘客家属向北京政府施压》,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55453>,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2日。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in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Opposition to U. S. Surveillance and Drones, but Limited Harm to America's Image*,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 登录时间:2014年7月18日;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group/7/>,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④ George W. Downs and David M. Roake, "Conflict, Agency, and Gambling for Resurrection: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Goes to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8, No. 2, 1994, pp. 362-380.

危险性就更大。^①

因为没有所谓的“重置按钮”,双边关系中的危机一旦出现就可能引发新一轮危机,导致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升级。随着危机中僵局的不断出现,行为体控制危机升级的难度会不断增加。危机的反复发生使各方均不愿妥协,并倾向于做出更强硬的行为,以展示更大的力量、决心和行为,而这在对手看来,无疑是极具挑衅性的。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形,危机的反复出现最终带来了更为激烈的对抗。^②即使危机的反复发生使行为体恐惧全面战争的出现,并迫使行为体做出了一定的战略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体更倾向于风险规避的选择。

鉴于反复性危机通常伴随着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应对此类危机的政策一般着眼于寻求危机管理的多种方式。1972年签署的《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INCSEA)旨在减少因船只和海军航空兵在相邻区域内的巡逻和监视而导致信息误判与摩擦升级的可能性。^③实际上,这同样可以作为南海的行为准则的参考。^④为降低冲突全面爆发的可能性,一些被普遍认可的“海上航道规则(rules of the road)”也许能成为危机各方未来在外交或法律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然而,就竞争的行为规范而言,要使各方达成共识,则需要实质性的政治意志、智慧以及外界(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协调。

若本文关于危机反复发生、双边关系改善以及妥协空间减小的论述得到证实,决

①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Hawkish Biases,” in A. Trevor Thrall and Jane K. Cramer,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 Threat Inflation since 9/11*,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79–98;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283–310;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87–112;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chapter 2; George A. Quattrone and Amos Tversky,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 pp. 719–736.

② Ja Ian Chong and Todd H. Hall,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pp. 7–43.

③ 参见“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Prevention of Incidents On and Over the High Seas,” <http://www.state.gov/t/isn/4791.htm>,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④ Rodolfo Severino, “Toward 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8/11/toward-a-code-of-conduct-for-the-south-china-sea/>,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Republic of Indonesia, “ASEAN Community in a Global Community of Nations,” http://www.asean.org/archive/Statement_18th_ASEAN_Summit.pdf,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china/item/declaration-on-the-conduct-of-parties-in-the-south-china-sea>, 登录时间:2014年7月23日。

策者和分析人士就需要从另一个维度思考持续性争端。毕竟,争端的解决、结束冲突以及完败对手,都取决于决策者在谈判中的灵活度。和解和接受次优解决方案余地的减少,实际上为进一步冲突的到来埋下伏笔。对于那些倾向于防止潜在紧张关系和令人不安的摩擦进一步恶化的人来说,这种可能性应引起他们的重视。就此而言,当我们试图理解国家间的持久性冲突时,本文提出的路径可以补充而非替代已有的持久竞争、安全困境机制和危机升级理论。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说明危机反复发生会强化国家间的摩擦,并为危机升级、误判甚至全面冲突创造条件。文中的四个案例表明,针对反复性危机,笔者所做的论述具有外部效度和现实意义。在案例分析中,笔者描述的动态过程已经展示出来,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发展更为精细的假设,以检验反复性危机爆发的机制过程,并根据详细的事实评估这一机制的合理性。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包括反复性危机中的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这种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鼓励他们在危机中孤注一掷而非采取妥协的策略。反复性危机如何在不同的政体和制度背景下发生,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方鹿敏 鲍磊翔译)

(截稿:2014年7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